

“我”是“不可信的叙述者”么？

——鲁迅作品《祝福》中的叙事者之探讨

杨卫民

(福州第一中学 福建 闽侯 350108)

摘要 以韦恩·布斯有关“叙事者”理论,对鲁迅作品《祝福》中“我”的心路历程进行深入剖析,否定“‘我’是不可信的叙述者”这一判断,同时进一步认识鲁迅小说集《彷徨》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 叙事学; (不)可信的叙述者; 祝福; “我”

最近读到罗宏丽、邹春盛两位作者在《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叙述者、叙事角度和叙述性描写——从叙事学的角度谈〈祝福〉的教学解读》,笔者很赞赏他们从叙事学角度探究经典课文的新思路,然而,将鲁迅《祝福》中的“我”界定为“不可信的叙述者”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很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要明确“不可信的叙述者”这个重要概念,而它又是基于对“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这两个概念的认识。

何谓“隐含作者”?这个概念的起点可追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第三章中提出了“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的观点:

“隐含作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1]

布斯这个概念在1961年正式提出,而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里,诚恳地接受了学界的质疑,他在1997年发表于《叙事》杂志的文章中坦言:

“在我早期的论著中,我认为存在这样两个高高在上的人:隐含作者和我(隐含读者);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完全的,充满信心、安全稳定、正确无误、聪明睿智。现在我认为隐含作者是多重的。”^[2]

可见,“隐含作者”这个概念本身,并非稳定可靠;而布斯自己最终也将复杂性格、多重人格赋予了“隐含作者”。那么,作为与“隐含作者”“信念和规范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叙述者”,“不可信的叙述者”的界定,也就扑朔迷离了。

而“隐含读者”这个概念,则更加不稳定,还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意识形态相关联。“隐含读者”被规定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与“隐含作者”保持一致。但这一阅读立场,则与后结

构主义提倡的逆向阅读立场相对立。譬如《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刘安杀妻以待奉饥饿的刘备,刘备将此事说与曹操,曹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以赐之”。作者显然是赞美这样的“效忠”“德行”的,而当今读者则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麻木,有些人惊悚,有些人批判。有惊悚情绪和批判意识的,才是具备人道意识的现代人。可见,要从“隐含读者”的角度来推出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也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

这一点,早在韦恩·布斯著述《小说修辞学》时,已经有所反思。他非常谨慎地讨论“不可信的叙述者”这一概念:

大多数非常可信的叙述者喜欢作大量附带的冷嘲热讽,因而,就其存在着潜在的欺骗而言,他们是“不可信的”。然而,尖刻的嘲讽并不足以使叙述者变得不可信,通常,说谎也并不一定就是不可信。

不可信的叙述者之间依据他们距离作者的思想规范有多远,依据他们在什么方向上背离作者的思想规范,存在着显著差别。^[3]

布斯考察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差距,简直像是一个研究“向量”的物理学家一样谨慎,引入了“方向”与“距离”两个角度的考量,绝不是简单的“二元论”。那么我们对于“不可信的叙述者”的界定,理当持谨慎审辨的态度。

现在回到《祝福》中来,“我”是不是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呢?

依照罗宏丽、邹春盛老师的界定,认为“和隐含作者的信念和规范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叙述者”,是“不可信的叙述者”,我们暂且以此为逻辑起点来进行探讨。我们不妨先从两位老师的表达中推导一下,他们认为此文“隐含作者的信念与规范”该是什么:

开始的“我”是可信的,对鲁四老爷充满厌恶、对

祥林嫂充满同情,和隐含作者的信念和读者的观念是一致的,但是,当祥林嫂开始追问灵魂的有无时,“我”就开始逃避了……已经由“敷衍者”转变为一个“冷漠者”,成为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了,和隐含作者、读者是对立的关系……“我”最终没能帮助祥林嫂,甚至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4]

由这些文字可以推知,他们认为隐含作者的信念是应该“对鲁四老爷充满厌恶、对祥林嫂充满同情”,不仅如此,“我”还必须能够不逃避“灵魂”的问题,不搪塞;进而还必须给祥林嫂以活下去的理由,甚而拯救祥林嫂。——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布斯自己所反省的“高高在上”“聪明睿智”的“隐含作者”了。鲁迅先生在《祝福》中真有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隐含作者吗?要明确这个问题,还须深入文本进行分析。

我们先要判断,“我”这个人物,对“灵魂的有无”这个问题是否具备判断力。“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吗?恐怕不是吧!况且,即便是科学唯物主义盛行的当代,仍有物理学家因“量子纠缠”理论,又转向认为“灵魂是存在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和学术能力确定灵魂的有无?更何况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隐含作者也好,真实作者也罢,恐怕都没有能力对“灵魂”这个概念进行证明或证伪,既然如此,“说不清”,何尝不是一种真实?

在文本中,“我”是否有逃避意识?笔者也认为“有”,但是,他所逃避的,不是祥林嫂的问题,而是自身的负罪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既然并不能证明灵魂之有无,回答“说不清”,原本就是很正当的事。况且还是因着悲悯之心,为了不“增添末路人的苦恼”而作的回答。可见,对祥林嫂的提问,“我”并没有逃避,而是深深感到“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竟挡不住一个乞丐般的女人的“三句问”。这绝不是“对她的追问充满了厌烦,开始逃避责任了”。可是,后来“匆匆地逃回四叔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这一句,是理解所谓“逃避心理”的关键。客观地说,无论从法律或道德伦理来分析,“我”对祥林嫂接下去可能做的任何事,都是不存在责任的。但是,“我”竟然“不安逸”,为什么?恰恰是因为,“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在良知层面认为自己身为知识分子应该能回答灵魂的问题、能拯救下层民众于水火,但却力不能及的人。换作普通的中国人(无论是当时或是当代),恐怕都不会有这样的负罪感。就像一个人向你问询一个陌生的地址,你无法给出答案,那么后来他迷路了,你要负

什么责任呢?世界上有这种负罪感的,即是“人溺己溺”的基督情怀了,而基督还要说一句“上帝只拯救能自救的人”。因此,笔者并不会因“我”的“不安逸”而鄙视他,相反,笔者很钦佩“我”的道德境界。

接下去,我们在文本中,读到了大量有关“逃避”的信息——对“说不清”妙处的解说,对福兴楼鱼翅的想往,对“活得有趣的人们”的揣测……这一切,其实都是自我的心理纾解,要安抚自己的“负疚”,而不是逃避对祥林嫂这个具体人物的责任,毕竟,“我”无力负责,也并没有法律规定要由“我”负责,何况后来斯人已逝。对非亲非故的已逝之人,“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该作何想法呢?“我”想到的是“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都还不错”。对这个想法的理解,课下注解为“激愤而沉痛的反语”,这个注解被质疑,是有道理的,毕竟接下去有一句“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笔者认为这还是以自我心理纾解为目的而作此想法,更准确地说,是对在现实中感到窘迫而急需纾解的“我”的自嘲与反讽。

这些纾解式的想法,一定是“冷漠”么?笔者由此联想到的,倒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老子》名言,想起的是对未亡人“节哀顺变”的劝慰。现在,祥林嫂死去,却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可以让“我”去安慰,在这样的空茫之中,老庄对于死亡的哲学是很容易涌上心头的。与其说“我”是麻木冷漠的,倒不如说,“我”要用种种死亡哲学来钝化自己敏感的神经,来消解因负疚而生的焦虑。况且,“我”接下去的思绪,并不是其他,而是回想起了祥林嫂“半生事迹的断片”,并将之“联成一片”,这个回想的过程,何尝不是对一个曾经鲜活的女子的凭吊呢?如若“我”真的变得“冷漠”了,倒可以与鲁四老爷把酒言欢了吧?只是,“我”只能心怀悲悯,却无力救助祥林嫂,因为她的症结不在贫病,而在整个鲁镇甚至整个中国都有着“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可是“我”却又无力背负或消除这个悲剧,因而才有了自我纾解的必要。清醒地留在鲁镇,则意味着痛苦,“我”需要一个解脱的出口。未离开鲁镇之前,这个出口,就只能是“祝福”的氛围。对祝福之夜天地圣众的遥想,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安抚。正因为“我”始终没有真的释然,才要想尽办法,借助各种念想、各种物质(包括祝福的空气)宽释自己,从莫名的负罪感中宽释自己。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因无力拯救苦女人而内疚的知识分子,他的自我安抚、自我宽释,是“隐含作者”的对立面吗?笔者藉由布斯“隐含作者是多重人格

的”这一新认识,就可以否定这个“对立面”了。如果他是“隐含作者的对立面”,那么,隐含作者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应该要永远保持“负罪感”,要永不得安逸,或是做一个“超人”,进而还是教导祥林嫂成功反抗的革命导师?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说,那么鲁迅的这部小说集,就不该叫做“彷徨”,而应该在“呐喊”之后,叫做“反抗”了。鲁迅先生是不在他的小说中树立“超人”或“圣人”的,也从来不以“超人”“圣人”标准来要求自己或现实中的他人,而罗、邹两位老师的文章里似乎有一种圣人逻辑:只要不是道德的圣者和行动的超人,这个人就是隐含作者和读者的对立面。可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终究是个人,他毕竟能力有限,他也还有自己的生活要继续,这是他要面对的日常。把人塑造得像个人,而非神圣,怎么就成了“不可靠的叙述者”了呢?

“我”的确是低于作者的期待,也低于读者的期待的;但是他并非隐含的作者或隐含读者的对立面,而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影子。一个读者将某种期待寄托在小说人物的身上,这是常态。读者将自身难以实现的事,托付给小说的主人公,而主人公一旦力量不足了,好的读者会反省自己,差的读者,只会批评主人公,以“对立”态度显示自己的高尚。然而作为作者的鲁迅所期待的读者却不是这样:他更要读者看清,这个“我”就是“苟活着的我”!这一点,是有鲁迅的杂文为佐证的。

颇具启发意义的是,在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第八章讨论“作为潜在作者的戏剧化代言人的可靠叙述者”这个概念时,这样评价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在《双重人格》中叙述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使他的故事看起来如同是论战的一部分这方面常常是老练的。……他把他自己及其弱点与他的主人公及其弱点等同起来的意图是特别有效的。^[3]

布斯对于那些与作者有相似弱点的叙述者,认为是“可靠的”。如果藉此来审度《祝福》的隐含作者和叙事者的关系,何尝不也是一种合理的途径?

那么,笔者如何认知这位“隐含作者”呢?我以为他也就是一个有良知却未必找到明确方法来拯救中国底层妇女的知识者,一个身上尚未割除旧文化基因、而已然接触了新文化的知识者。有同情心,却不一定有能力改变苦命人的命运,这是社会中一些良知者的常态。至于“隐含读者”,在笔者看来,鲁迅正是写出了隐含读者不敢写出的真心话——解剖了自己,

也解剖了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仍在彷徨中、也缺乏执行力的有知识的读者的内心。不要把作者与读者都当做“高高在上”“永远善良且无限智慧的神人”,作者写出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不敢正视的内心,才能让那些终日喊着“主义”的他们眼光向下,看清中国社会的现实,看清自己的软弱,而后力图去改变。这样看来,“我”恰是“可信的叙事者”。

“‘我’是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对立面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还直接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是否有“自我解剖”的精神?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直接参与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创作过“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题材,他从旧时代走来,认识到传统文化之“明哲保身”的血液细胞在自己身上并未根除,这才会将自己定义为“彷徨者”“苟活者”,这样的直面社会人生进行自我剖析的鲁迅先生,才是他的本相吧?

大家都说鲁迅是“反封建”的,但是有些人却没有认识到要反抗的“封建”究竟在哪里,它并不止在鲁四老爷的书房里,更是在所有人的灵魂里:在柳妈干枯的小眼睛里,在鲁四婶的“慌忙大声”里,在善男信女们的“咀嚼赏鉴”里,也在“我”的“说不清”和“舒适”里……笔者以为,在作者的意念中,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并非先要反抗某个具体的谁,而是先要反省自己,进一步革新自己,进而“反抗绝望”。而这一点又是如此艰难:传统文化,渗透在一代代知识者的血液里,几乎成了基因般的存在,正如老庄哲学之于中国人,常常优劣交织,甚至“精华”的背面就是“糟粕”。如何革新自我,这是鲁迅先生毕生之思考与实践。

我们都知道,小说中的“我”是虚构的,不是作者自己;但是鲁迅《祝福》里这个“我”,却分明是如此典型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令人读着,都会如芒在背,而非轻松地站到其对立面,站到道德高地上去鄙视他,这就是鲁迅真正的精彩。

参考文献:

- [1]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69.
- [2] 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6-77.
- [3]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148-149,200.
- [4] 罗宏丽,邹春盛. 叙述者、叙事角度和叙述性描写——从叙事学的角度谈《祝福》的教学解读[J]. 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8(7).

(责任编辑:刘火苟)